

蔡东藩·著 二月河·序

蔡先生的这部书，从文学上看去，只能说是中平之作，但，它是一座矿山，山一样的巍峨，中有茂林修竹，流泉飞瀑，内含煤铁金玉，自然也有土，有毫不起眼的砂石，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，前面说过，它不是应选命评论应运而生，而是应时而生，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，新时代还在阵痛时，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，可以听为挽歌，也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催生符，从实效意义上看，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廿四史的，不能，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，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，要绪，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寻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从这个意味上说，真的是厥功甚伟了。

二月河



元史演义



元史演义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蔡东藩 / 著

二月河 / 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元史演义/蔡东藩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3.10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ISBN 7-5039-2412-8

I. 元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0734 号

元史演义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著 者 蔡东藩

责任编辑 李世跃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,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,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6.25 插页 44

字 数 390 千字

印 数 500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412-8/I·1111
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总 序

·二月河·

长时期以来，“成分”的阴影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。封建时代，有士大夫、庶人、农工商、地主、佃户、贱民种种“阶层”，或者叫“阶级”。对待各个阶层，使用法律不一，政治待遇不一，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，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政治、经济、综合国力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、大改观，惟独“成分”这意识存在依然。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封、资、修”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，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“存在”，且是势头不减，愈演愈烈，生命力鲜活。从深层次原因上说，窃以为这就是“文革”的重要成因之一。从根本上认识、解决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。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，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，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、健康起来。

“成分”这种社会政治理念，反射在文学领域，构成了文学创

作的一边倒和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。一部作品出来，首先拷问它是“香花还是毒草”。肯定了它“没有问题”，然后再说别的。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，就是服务对象的单纯：为下里巴人而创作，“阳春白雪”便受扼制。很简单，倘若你只爱春天，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、菊花与梅花。本来，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是真善美、爱与死，夺人魂魄，陶人性情，增人学养，冶人操守，这种种功能未必样样都与“无产阶级”、“贫下中农”这些阶级成分挂钩。即使是无产阶级，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，有提升素养、接受人类美好思维的必要。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，必定的后果是“过犹不及”。

老实说，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三里湾》及《苦斗》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；柳青、赵树理、欧阳山、曲波这一大批作家，都是十分了得的。但由于这种创作理念的局限，在文化枯竭、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，读者选择了它们。它们也有耀眼的辉光，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。但是，这只是一时之作，难以永恒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它本来就是为这“一时”服务的作品。

今天翻翻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，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，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怡人的风采，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，那心里暗示的是腻味反感“文革”这场伤情事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怎样？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受“阶级说”的影响较少，《李自成》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，但后来变成“阶级歌颂”，“高、大、全”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，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。

这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？一则是“应人”之作，服务的对象狭小，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；二则是“应时”之作，“时过”自然“境迁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个是“求仁得仁又何怨”！

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？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作家好比是木头，评论家则是木耳。”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、太善良了。若说“评论家应该是木耳”，似乎更贴切一些。因为事实上，木头不仅生木耳，还会生蘑菇，生野草，生苔藓……向木头上钉钉子，用斧子劈它

成柴，锯成锯末……可以说都叫“评论”。

生木耳，是于人有利的，可以做美味进食，营养作用颇多，但用刀、斧、锯这类利器去评论，得到的是什么？木头们畏惧斧钺加之，就会一律按预先允许的“规范”去生长，这样去要求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花们长出去前就先要想：我不依“政治标准”长出去是什么花？恐怕连狗尾巴草也不是！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“毒草”呢？

文学艺术，它的功能决不仅仅是“歌颂”和“暴露”，它还有“告诉”、“讽刺”、“调侃”、“和息”、“要求”、“给予”……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。用了“政治标准”这把惟一的尺子，不是这，便是那；不是拥护，肯定就是反对。表述了改革家、工人农民“火热”的生活，农民起义，那就是“主旋律”，否则，你的嗓门天赋高了，不单不当你是帕瓦罗蒂，还会当你是“噪音”，掩耳而走，甚或“吾虽不及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”，当你别有用心也可未知。

用“政治标准”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？它既不是“纯文学”，也不是“雅文学”；它不是纯历史，又没有虚造历史；它有歌颂，也有暴露，更多的却是“告诉”、“讽劝”，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。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入“先进文化”的书目里头。

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，是中国独有、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述。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“绝版”了。我的估计，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。

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，这可能与我们“敬惜字纸”的民族习惯有关。除了历史，还有野史、私史、笔记、日记……配合这一系列庞杂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资料，还有小说、诗词、说部、传本……直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、书摊、小曲、民歌、鼓儿哼……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，众星捧月地簇拥出“二十四史”来（清史尚是“稿”，未能定正）。倘没有绝大学识、绝大胸襟器量、绝好智商与精力，要做蔡先生的这番事业，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歌德巴赫猜想般困难，或者是“骑自行车上月球”那样的妄想。

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部书的。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

倾向，那倒是实话。蔡先生是个好老师，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，顶多偶尔地、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——余下更多的，是给读者以思考判断的空间。

一部好的历史实录，何尝不可当做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？荆轲刺秦王，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，那种肃杀，秋高凛冽，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，慷慨赴义的情致，是极致的文学描摹。《廉颇蔺相如传》是史记正述。“相如因持璧（和氏璧），却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……”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“怒发冲冠”一词出自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。

一部好的文学作品，同样可以看作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，它不以一朝一代一兴一替为局限，表现的是中国封建历史的整体形态，代代都是这样，这是事实！

然而，好的历史书，好的小说，偏偏都不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贾宝玉是哪个阶级的？曹雪芹歌颂了，赚了三百余年无数人的眼泪。就因为它真实，或者说“实事求是”。

这是蔡先生的追求，他不说假话，也不说曲阿的话。他所演义出来的故事，都在史据中斑斑有考。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徐懋功未作军师，李药师（靖）何来仙术？罗艺叛死，乌有子孙？叔宝（秦琼）扬名，未及儿女。唐玄奘取经西竺，宁惹妖魔……则天淫秽，不闻私产生男；玉环伏诛，怎得皈真圆耦？种种谬妄、琐褻之谈，辞而避之。”只有这样严肃谨慎的人，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
然而，我们似乎并不珍惜这些仅存的文史学。还在用“阶级论”这把尺子在量，用斧子去砍它们。

记得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那些红卫兵们曾经有过一个设想，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。想是想，真的做起来，他们还是傻了眼。整个的二十四史中，农民起义只能看做是历史的一种“现象”。这个朝代有，那个朝代也有，支离破碎各自在那里，根本行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绪。我猜“儒法斗争”的那段历史观表述，也是一种很无奈、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“阶级斗争”史观的做法罢了。蔡先生的这部堪称“通史演义”的书当然

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，受到冷落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中国的文化中糟粕很多，其中有些东西很要命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中含有的“落后量”和“落后质”。但是不是落后了便应轻视、蔑视呢？这需要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认真思考一下。一只乾隆笔筒，放在现在的书架上，和《大不列颠词典》一处，是增色还是减色？一架春秋“水洗”，已不再用来洗手，是保存研究，还是捧出去卖了铜器？就算碰碎了，比如钧瓷，已经极难见到完整的器皿，但在钧瓷窑址未发现之前，碎片与黄金等价。

我以为，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，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，一是它是否拥有读者，二是它是否拥有时间。二者倘居其一，即是具备“素质”的作品。什么是“素质”？它也可能是进步的，也可能是落后的；但它即使是落后的，也是有价值的，倘二者皆具备——即使它是“反动的”，也是永恒的，无法消灭的。谓予不信，可以看看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蜃楼志》一类作品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两部作品的主旨是陈腐的、落后的，但是，无论什么样世界观的评论家，你可以说三道四，可以恨之入骨，可你就是消灭不掉它！因为它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，无阶级、无意识的“芳情只自遗”，践踏成泥“依然香如故”。

啊，我们在审美时，总是在辨认哪是香花，哪是毒草。我们总是通过显微镜、放大镜和化学试剂在观赏自然，这样做不累吗？安徒生童话里讲了一个故事：一座烧焦了的房子，旁边盛开着一丛绚丽的玫瑰。画家走过来，他感动了，便在旁边写生创作。倘这样问，这画家他是在为贫下中农作画，抑或为地主阶级？问话的人是否有毛病？我们警惕得是否过分了？看见一部作品，倘是写“要人”的，立刻联想到它是否“利用小说”来反党？写知识分子遭遇的，是不是“在讽刺”党的政策？写“三家村”的就是在组织什么小集团，写海瑞的那是为某某翻案。《水浒》是写“投降”，《三国》呢？是“英雄创造历史”……过敏得像得了神经病，脆弱得像系一根黄瓜或者“琉璃扑棱”儿。

蔡先生这部书的题材是写帝王将相为主的，和所有的旧知识分子一样，他无法避免一些陈腐的、落后的甚至是“反动”的东

西。“反动”是否一定就坏，“革命”是否一定就好，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。但蔡先生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“两个拥有”，并还要“拥有”下去。我看它的生命力起码比我的书要强。从实效意义上看，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“二十四史”呢？不能。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。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，要绪，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真的是“厥功甚伟”了。

我是反感成分论的。无论从社会学概念，还是以文学评论界定标准，统都反感。看到现在一些评论家：你写一个海瑞式的正直官员，他说你在宣扬清官；你写一个忠于国家爱人民的志士，他说你歌颂“愚忠”；你写帝王将相呢？你是在颂扬“君权统治”，是“封建余孽”，是“奴才”……还是安徒生那则童话，画家是此意识，麻雀们又是彼意识，“吱！那有什么画头？那不过是些红的和绿的堆起来而已！吱！”

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？歌颂他们便是反民主？我看不能这样说。我不能同意，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中国，甚至我们现在的中国。只要走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，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，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统一、文学艺术昌明，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，无论李世民、雍正、李白、辛弃疾，抑或毕昇、黄道婆、蔡伦、郑和……就是要歌颂，管你说什么！

蔡先生的这套书，从文学性上说，只能说是“中平之作”。它是一座矿山，山一样的巍峨，中有茂林修竹、流泉飞瀑，内含煤铁金玉，自然也有土，有毫不起眼的砂石。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。前面说过，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，而是应时而生。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、新时代还在阵痛时，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，可以听为挽歌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。这岂是几个在沙龙里坐唱，坐看别人辛苦，封就了自家是文坛盟主、骚坛执牛耳辈所能为！

是为序。

2003年10月

自序

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，本乏纪录；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。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

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元史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祿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。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、三年，私家著述，鲜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核定异同，观徐一夔与王祿书，谓：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，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惟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，核言未必，驯首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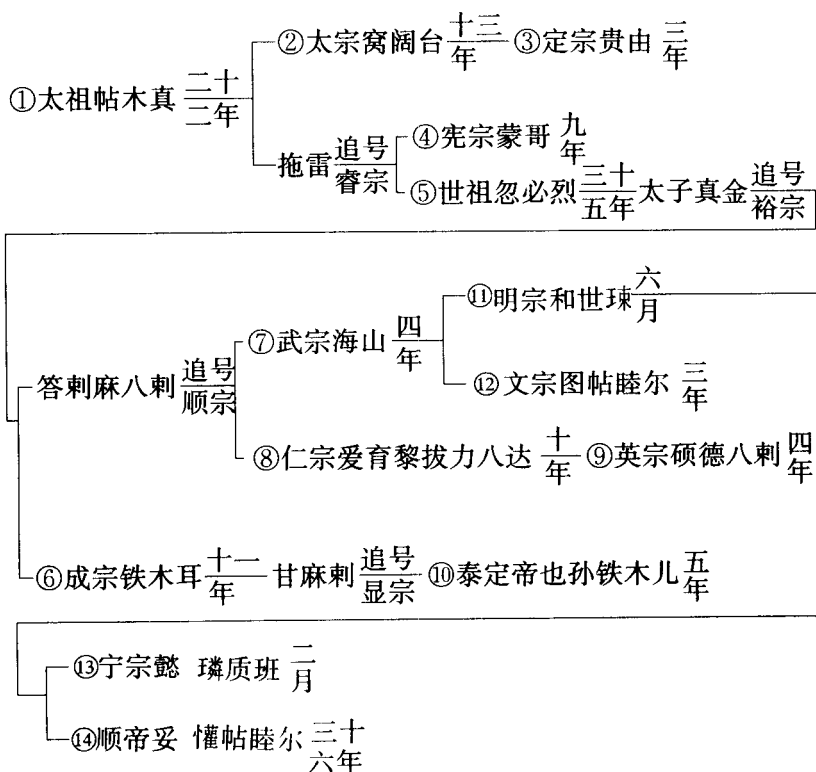
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促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

厥后，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元秘史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记世祖事，《庚申外史》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元史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，顾仅至定、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流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沈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

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鄙陋，窃欲融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。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，语则从俗，不欲求深。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、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；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。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，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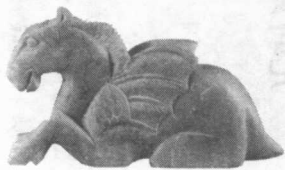
元代世系图



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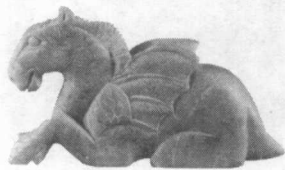
朝 (1206~1368) 公元 1206

年，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各部，以和林为都城，建立了大蒙古国，本人被尊称为成吉思汗。公元 1279 年，元军南下攻灭南宋，统一了全国。元朝的政权机构，中央以中书省（有时又设尚书省）、枢密院、御史台分掌政务、军事与监察。地方建置多样化，今山东省、河北省、山西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，称为“腹里”，归中书省直接管理；诸王封地及西藏地区，归中央宣政院管理；其他地方划分为 10 个行中书省，简称行省或省。元朝注重兴修水利，农业与手工业逐渐得到恢复，科学文化继续发展，海外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迅速扩大。以元曲、元杂剧为代表的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；天文学、农学的研究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。



成

吉思汗（1162~1227），蒙古帝国的创建者，原名铁木真，出生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。从小历经磨难，长大后，勇敢果绝，能征善战，先后率部击败众多蒙古部族，1206年被推为“大汗”，号成吉思汗，国号为大蒙古，立都和林。他即位后，根据蒙古族游牧民族的特点，创造了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军事行政组织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先后挥兵越过印度河，高加索山脉，席卷俄罗斯土地，直到今天的匈牙利、德国的疆界，为后来那个横亘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蒙古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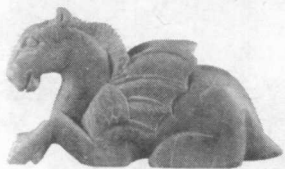
赵

孟頫 (1254~1322)，字子昂，号松道人，湖州（浙江吴兴）人。本为宋代宗室，入仕元代，官至一品，为此颇为人所非议。赵孟頫从5岁起开始学习书法，书写十分勤奋，“下笔神速如风雨，一日能书一万字”，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都很有造诣，以楷书见长，与颜、柳、欧齐名，人称“欧、颜、柳、赵”。同时，他还是元代文坛的领袖人物，通晓音乐、诗文俱佳，尤其擅长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、鞍马和竹石，工笔、写意、设色、水墨无一不精，赵孟頫还将书法与绘画用笔有机地结合起来，《人骑图》便是这种结合的代表作品。卷画一奚官，乌帽朱衣，按辔徐行。人物神态奕然，骏马造型准确。此图用笔精工，缜密严谨，笔意古朴秀雅。是赵孟頫人物、鞍马画的代表作。卷末自题云：“吾自少年便爱画马，尔来得见韩幹真迹三卷，乃始得其意云。”



元

朝陶瓷一方面继承宋瓷传统，另一方面还引进了西亚伊斯兰陶艺新材料、新技术、创造出青花、釉里红、钴蓝釉、铜红釉、卵白釉等新品种，开辟了中国陶瓷以彩绘和颜色釉为主的新时代。这些新的发明创造，为明、清陶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元朝陶瓷的器型都做得很大，盘、碗、壶、罐容量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。陶瓷纹样精致华丽，布满全身，层次之多，描绘之精，也是空前的。



刘

贯道，字仲贤，中山（今河北定县）人，生卒年不详。擅画人物，至元圣年曾因画真金太子像而补御衣局使。笔下人物古朴，颇有晋、唐风格，这幅设色绢本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。画中的主人公依阮独卧榻上，手执麈尾，锁眉凝思，对应着身边的蕉荫仕女和身后的人物屏风，整个画面布局紧凑，疏密有致；人物神态舒畅，古趣盎然；笔法紧劲庄重，颇有宋代院画之风。

